

清代常州学派的名义及范围

申屠炉明

(南京大学 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常州学派是清代影响很大的学术流派, 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众。然其名称的出现以及该学派所包含的人物等问题少有人关注。文章认为常州学派既是以《春秋公羊》学为中心的学术派别, 当以学术宗旨为判别标准, 并非同一地的学者都可归入一派。

关键词: 常州学派; 春秋公羊学; 今文经学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1) 05-0102-06

“常州学派”的名称, 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可以肯定的是, 早在庄存与、刘逢禄时代并无此名称。庄、刘的学术体系, 后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传授下去, 形成了一家之学。开创这一流派的庄存与以及发扬光大的刘逢禄都是江苏常州人氏, 人们便称这一学术流派为“常州学派”。因此, 可以说“常州学派”的名称是人们从后往前追溯而定的名称。在今日的学术思想史研究中, “常州学派”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名称, 似乎无须再论, 其实还是有必要再作讨论。如果追溯一下, 便可发现此名称出现的历史并不长。兹列举有代表性的官私著述, 以便观览。

《清史稿》是民国初年修撰的官书, 号为官修正史。奇怪的是《庄存与传》短短数百字, 直如一篇简单的个人简历, 于其生平著作、学术思想等, 无一字道及。《清史稿》简陋如此, 宜为后世不满, 有重修“清史”之议。较早的《清史列传》保留了不少当时的档案材料, 虽较《清史稿》详实多了, 但也不过是个人经历的一篇流水账而已, 传主的生平著作、学术思想仍无反映。

私人著述中提到常州学派这个词, 据我所知, 目前所见最早提出的是清末的谭献。谭献字仲修, 号复堂, 浙江仁和人(今杭州市)人。生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 卒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复堂日记》卷二“《宛邻书屋古诗录》, 十五岁以来所诵习。汀州陷时, 书篋尽失。今年常州所刊本, 蒋子相贻我, 得还旧观。庄中白尝以常州学派目我, 谐笑之言, 而予且愧不敢当也。盖庄氏一门、张氏昆季、申耆、晋卿、方立、稚存、渊如皆尝私淑, 即仲则之诗篇又岂易抗颜行乎?”^①

谭献此条日记所记的年份是己巳年, 即同治八年(1869)。庄氏一门指庄存与父子祖孙; 张氏昆季指张惠言兄弟。李兆洛字申耆。董士锡字晋卿, 系张惠言甥。董祐诚字方立, 精于名物典章、礼仪舆地之学, 尤深于历算。洪亮吉字稚存。孙星衍字渊如。以上所举皆常州一地的著名学者。可见这些人就是谭献心目中常州学派的人物。谭献的弟子章太炎更是从学术渊源的角度提出了常州学派的概念。^②章太炎的《馥书》重订本第十二篇《清儒》说“文士既已熙荡自喜, 又耻不习经典, 于是有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LSB005)。

作者简介: 申屠炉明,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思想史。

^① 谭献《复堂日记》卷2,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 第44页。

^② 《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十六年二十三岁条”云“肄业诂经精舍。时德清俞荫甫先生主教, 因得从学。并就仁和高宰平先生问经; 谭仲仪先生问文辞法度。”谭献初名廷献字仲仪。参见《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上海: 上海书店, 1986年。

常州今文之学，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①

案：此篇《楹书》初刻本无，见《楹书》重订本，后来的《检论》也收入此篇，内容同。据朱维铮研究，《楹书》重订本在辛亥革命前有两种版本，均在日本出版。首出一种标为“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五年夏四月出版”，即1904年的初版本。^②写作时间尚在此前。章太炎在《清儒》篇讲到某某之学，实际上谈的是学术流派。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明确提到了“常州学派”的名称“常州之学复别成宗派，自孙星衍、洪亮吉。初喜词华，继治掇拾校勘之学。其说经笃信汉说，近于惠栋……武进张惠言久游徽歙，主金榜家故，兼言礼制。唯说《易》则同惠栋，确信讖纬，兼工文词。庄存与与张同里，喜言《公羊》，侈言微言大义。兄子绶甲传之，复昌言钟鼎古文。绶甲之甥有武进刘逢禄、长州宋翔凤，均治《公羊》，黜两汉古文之说。翔凤复从惠言游，得其文学，而常州学派以成。”^③

此后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④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⑤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⑥一直到现在的《辞海》都是如此提法。

常州学派的名称，现在看没有多少疑义。但诸家划定的范围大小不一，即哪些人可归入常州学派范围之内，哪些不应归入？循名责实，需要作一番辨析。兹举有代表性的观点后再作分析。从谭献《复堂日记》和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一文所举的人物看，他们将当时常州一地的著名学者多归入常州学派之中。他们所说的“常州学派”，细绎其含义，是泛指清代常州府学术繁荣，学者众多，形成常州地方性的学术派别。这种提法并未考虑这些学者之间学术旨趣是否相同的问题，重点指的是常州的地域性问题。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已注意到常州学术的特点，梁启超说“常州学派有两个源头，一是经学，二是文学，后来渐而为一。他们的经学是公羊家经说，用特别的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庄方耕存与、刘申受逢禄开派。他们的文学是阳湖派古文，从桐城派转手而加以解放，由张皋文惠言、李申耆兆洛开派。两派合一产出一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考证学的基础上建设顺康间的经世致用之学。”案：梁氏所说的“常州学派”，也是把常州一地的著名学者归入为同一学派中。不过，他已将这些人分成了两个系列，一个是经学系列，一个是文学系列。特别是指出了经学系列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经学研究是《春秋公羊》学为中心，极为精确。

梁启超提出的两个源头说，可视为广义上的常州学派。其所举的张惠言等人在当时是著名的经学家，后来只不过他们在经学上的成就往往为文名所掩。张惠言、李兆洛等在文学方面开出阳湖古文一派，不在这里讨论。后世所称的常州学派，正是由于他们在经学研究中别具特色，即通常所说的以《春秋公羊》学为中心的学术派别。因此，这里首先要分辨的是，常州同一地的学者能否都归入常州学派？

我们知道，不同的学派，其治学宗旨各不相同，所以才会形成不同的学派。如清代浙东学派研究的主要是史学，故成一学派。其他各派如吴派、皖派，他们研究的重点虽都在经学方面，但风格也不尽相同。所同的是两派学者都是从《尔雅》、《说文》入手，即由辞入道，由小学入经学的途径，从事的是考文、审音、校勘、注释、证说名物度数的的工作，故人称为朴学。唯独常州诸贤不屑于“名物训诂”，如阮元所说的那样“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认为探求经书中的大义，才

① 《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8页。

② 《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前言》第14页。

③ 刘师培《左龠外集》卷9，载《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宁武南氏校印本，1997年。

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原为梁氏任教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时所编的讲义，约撰于1922年冬至1925年春之间。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原为梁氏任教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时所编的讲义，约撰于1922年冬至1925年春之间。参见朱维铮《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的“校注前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⑤ 据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的“凡例”后署年份为1924年。

⑥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

能经世致用。显然，常州学派的治学风格与乾嘉时期的考据学派异趣。也就是说，同是常州一地的学者只有治学风格与考据学派异趣的人才可归入常州学派中去，这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只要看看这些人的治学风格即可明了。除了庄氏一门外，他们中有经学专门著作的是张惠言、洪亮吉、孙星衍。下面从他们的著作着手，分析他们的学术特色。

张惠言，字皋文，武进人。少孤贫，年十四即为童子师。嘉庆四年（1799）进士，改庶吉士，充实录馆撰修。六年（1801），授散馆编修。七年（1802）卒，年四十二。据阮元的《张皋文仪礼图序》及清嘉庆道光间刊刻的《张皋文笺易诠全集》所载：张氏《易》、《礼》学著作有《周易虞氏义》九卷、《虞氏消息》二卷、《虞氏易事》二卷、《虞氏易候》一卷、《虞氏易言》二卷、《周易郑氏义》二卷、《周易荀氏九家义》一卷、《虞氏易礼》二卷、《易义别录》十四卷、《易纬略义》三卷、《易图条辨》一卷、《读仪礼记》二卷、《仪礼图》六卷。另有《茗柯文编》四编、《词》一编，凡十六种。^①阮元称“其学要归六经，而尤深于《易》、《礼》”。张氏之学以《周易》与《仪礼》最为精深，这也是当时学术界的公论。

当清代汉学复兴时，惠栋始考汉代孟、京、荀、郑、虞诸家古义，作《易汉学》。又自为解释，作《周易述》。惠氏的工作具有开创性，大旨遵虞翻，补以郑、荀诸儒。然未能尽通旁证。原因是汉代说《易》，孟、费诸家各有师承，势不能合。荀是“古文”，虞则“今文”，而惠氏强合之，故学者少之。张惠言的《周易虞氏义》独申虞氏之义，较惠栋之作精审多矣。张惠言在《仪礼》方面的著作以《仪礼图》一书最负盛名。总之，张惠言的经学研究属于“今文经学”方面，这是没有疑义的。但说到底仍是惠栋吴派的做法，只不过方法更加精密而已。章太炎认为他的《周易》研究是“吴派的变迁”，其《仪礼图》则近皖派，所以有人将之列入皖派。^②我认为很有道理。也就是说，张惠言所研究的文本是“今文”方面，但研究的方法仍属吴、皖考据学派。与常州之学重微言大义，显然不同。

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阳湖人。据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载：二十四岁入学为附生，与同邑黄景仁为诗歌唱和，有声誉，时人目为“洪黄”。后从安徽学使朱筠学，受业为弟子。^③又与当时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王念孙、汪中等人游，学业大进。家居时与孙星衍相切磋，时人又目为“孙洪”。生平好学，至老不倦。撰著行于世者有《春秋左传诂》二十卷、《春秋谷梁古义》二卷、《汉魏音》四卷、《比雅》十二卷、《六书转注录》八卷、《弟子职笺释》一卷，另有《补三国晋书地理志》、《十六国疆域记》、《诗文集》等若干卷。^④从洪亮吉的学术专长看，精于经学、小学及史地之学，长于训诂考证。《春秋左传诂序》云：“余少从师受《春秋左氏传》，即觉杜元凯于训诂、地理之学殊疏。及长，博览汉儒说经诸书，而益觉元凯之注，其望文生义、不臻古训者，十居五六……于是冥心搜录，以他经证此经，以别传校此传……训诂则以贾、郑、服为主。”《春秋左传诂》者，“诂”、“故”、“古”字同，欲以存《春秋》之古学。可见洪氏之学也系朴学一路，与常州之学重微言大义，显然也有很大不同。

① 阮元《擘经室一集》卷11《张皋文仪礼图序》中还载《说文谐声谱》一种，此为未成之书，后王先谦刊入《皇清经解续编》中，9卷，署名张成孙著。案《说文谐声谱》原为50卷，此为节录本，原书佚。成孙系张惠言子。《自序》云：“先君子以为，形声者尤足以考字体之原委，声韵之从违，乃于许书别录之。俾各以声相从，求之古人韵语，分别部居，为《说文谐声谱》。以言三代之韵，秩如也。辑录未竟，遽捐馆舍。”又云，惠言卒时，其方十四岁。年二十二，从庄宝琛学，庄促其补完此书。惠言原稿居十之五，成孙补作居十之五。

② 近人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首载《章太炎先生论订书》。（支）问“张惠言师传在皖，家法近吴，究应何列？”（章）答“张之《易》近吴派，其《礼图》则得诸皖，仍可入皖。”参见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

③ 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4《书朱学士遗事》云“朱学士，名筠，大兴人。以乾隆辛卯视学安徽，延余及亡友黄君景仁襄校文役。先生学不名一家，尤喜以六经训诂督课士子，余与黄君亦从受业焉。”

④ 光绪年间洪用懃授经堂所刊《洪北江全集》共220卷，供稿17种尚不在此数。

孙星衍，字伯渊，一字渊如，阳湖人。其《问字堂集》中有《答袁简斋前辈书》一通，自述为学次第“侍少读书，为训诂之学，以为经义生于文字，文字本于六书，六书当求之于篆籀古文，始知《仓颉》、《尔雅》之本旨。于是博稽钟鼎款识及汉人小学之书，而九经三史之疑义可得而释。及壮，稍通经术，又欲知圣人制作之意，以为儒者立身出政，皆则天法地，于是考周天日月之度，明堂井田之法，阴阳五行推十合一之数，而后知人之贵于万物，及儒者之学之所以贵于诸子百家。虽未遽能贯串，然心窃好之。”^①

洪亮吉将孙氏引为同道，在写给朱筠的信中说“不孝近获一友，曰孙星衍。生有异才，兼勤小学，六书则尤善谐声，九经则稍通训诂，已能校二徐之失，订《说文》之误矣。惜先生尚未见之，渠亦以不厕执经之席为恨也。”^②从上面孙氏自道及他人论及学术专长，都可知孙星衍是正统的考据学家，不应归入常州学派。

赵翼，字耘松，号瓯北，阳湖人。赵翼的学术专长在史学，《廿二史劄记小引》称“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唯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有所得辄劄记别纸，积久遂多”云云。虽是自谦之词，然也系实情。

李兆洛，字申耆，阳湖人。嘉庆十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安徽凤台县知县，有政声。李兆洛是魏源心目中常州“并世两通儒”之一，“乾隆间经师有武进庄方耕侍郎，其学能通于经之大谊，西汉董、伏诸老先生之微淼，而不落东汉以下。至嘉庆、道光间而李先生出，学无不窥，而不以一艺自名，醇然粹然，莫测其际也”^③。魏源之所以视李氏为通儒，是因为乾隆中叶以后，海内士大夫大兴汉学，以大江南北为最盛。如苏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孙氏，嘉定钱氏，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争相治训诂音韵之学。反而视清初的顾炎武、常熟二顾（顾祖禹、顾栋高）、四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诸人的学术是史学，而非经学；或指为是宋学而非汉学，“辘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李兆洛虽生于此乡，独治《通鉴》、《通典》、《通考》三通之学，与前所举诸儒，不趋声气。从为学的目的来说与庄存与同，求有益于社会。但治学的方法显然与庄氏不同。

以此论之，同为常州人氏的张惠言、洪亮吉、孙星衍、赵翼、李兆洛等不可划入常州学派中去，这些人在经学上的见解不尽同于庄、刘诸氏极为明显。

常州学派以研治经今文学闻名于世，尤其是《春秋公羊》学。然则清代学者中治今文学有名者也有不少人，这些人中除庄氏一门及有师承关系者之外，其他人是否也当入该学派中？这个问题也须作一辨析。

清代研治《春秋公羊》之学有成绩的学者，如孔广森一生精力多用在《春秋公羊传》上，作《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凌曙有《公羊礼疏》十卷、《公羊礼说》一卷、《公羊问答》二卷、另有《春秋繁露注》十七卷，陈立有《公羊义疏》七十六卷，包慎言有《公羊历谱》十一卷。治《春秋谷梁》有成就者：许桂林《谷梁例释》四卷，候康《谷梁礼证》二卷，柳兴恩《谷梁大义述》三十卷，钟文蒸《谷梁补注》二十四卷。此外，清代学者中治今文有名者，如陈乔枏《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三家诗遗说考》、《四家诗遗文考》、《齐诗翼氏学疏证》，迮鹤寿《齐诗翼氏学》，邵懿辰《礼经通论》。以上诸人在近人著作中，或列入甲，或列入乙，或以为皆不可归入常州学派之中。

章太炎认为，“今文”之学，不专在常州。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戴望，执守今文，“深闭固拒，而附会之词亦众，则常州之家法也”。其他，如“凌曙之说《公羊》，陈立之疏《白虎》，陈

① 孙星衍《问字堂集》卷4，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② 洪亮吉《与朱笥河先生书》，载《卷施阁文甲集补遗》，收入《洪亮吉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48页。

③ 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载《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61页。

乔枳之辑三家《诗》、三家《尚书》，只以古书难理，为之证明，本非立一定宗旨，其学亦不出常州。此种与吴派专主汉学者为一类，而不当于常州派并存也……其他如孙之《尚书》，江之《礼书》，或采《大传》，或说《戴记》，皆今古文不分者。故不得以偶说“今文”经传，遂以常州家法概之。《春秋》三传，《谷梁》最微。桐乡之钟，丹徒之柳，番禺之侯（尚有江都梅蕴生，其书未见），皆具扶微补绝之心，而非牢守一家以概六艺者，与常州家法绝殊。要之，皆吴派之变迁而已”^①。

案：章太炎认为清代“今文”之学，不专在常州。换言之，常州之学也不可概清代“今文”之学。章氏此言，诚为有识之论。然章之所划分的常州学派范围，仅限于庄氏一门及弟子而已，过于狭窄。这是因为章太炎坚持古文经学立场，门户壁垒极严，故划常州学派的界限亦极严格。认为只有具“深闭固拒”特点的，才是常州之家法。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将龚自珍、魏源两人也排除在常州学派之外。他认为，龚自珍不可纯称“今文”，以其附经于史与章学诚相类，也是从他的外祖父段玉裁“二十一经”之说，尊史为经，扩大范围而已。^②又如魏源，章太炎认为也不得附常州学派，理由是《诗》多出三家之外，说《书》不能守欧阳、夏侯，“杂糅瞽乱，直是不古不今，非汉非宋之学也”^③。这里章太炎同样以纯学术的观点评论魏源，是针对魏源的《诗古微》、《书古微》而发，以为说今文《诗》须严守齐、鲁、韩三家家法；说《尚书》须严守欧阳、夏侯家法。否则就是不古不今，非汉非宋之学。魏氏二书中诚有章太炎所举的若干不纯之处，但大旨却是表彰“今文”，批评“古文”，是为了“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④。龚自珍、魏源皆从刘逢禄受《春秋公羊》，这在他们本人及他人的书中都有记载。龚自珍《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之六说：“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⑤又《己亥杂诗》第五十九首说“端门受命有初，一脉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刘礼部，东南绝学在毘陵。”自注云“年二十有八，始从武进刘申受受《公羊春秋》。”龚为著名朴学大师段玉裁的外孙，自小接受段氏的教导，研究《说文》之学。^⑥自从接受了《春秋公羊》学后，决心烧尽“虫鱼之学”，即乾嘉以来朴学家从事的考证之学，要追求“微言大义”了。^⑦魏源之子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称“学《公羊》于刘申受先生逢禄”^⑧。龚、魏既受学于刘逢禄，则当归入常州学派。支伟成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部分接受了章太炎的建议，将龚、魏排除在常州学派之外，仍将陈立、柳兴恩、连鹤寿、邵懿辰列入。支伟成将孔广森列入“皖派经学家”，大概是根据《清史列传》的《儒林传》记载，孔广森曾受经于戴震、姚鼐之门。^⑨而阮元《庄方耕宗伯说经序》明确说“公通籍后，在上书房授成亲王经史垂四十年，所学与当时讲论或枘凿不相入，故秘不示人。通其学者，门人邵学士晋涵、孔检讨广森及子

①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3页。

② 段氏《经韵楼集》卷9有《十经斋记》，谓中国古代经典集为“十三经”，其意甚善。“愚谓当广为二十一经，《礼》益以《大戴礼》；《春秋》益以《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周礼》六艺之书数，《尔雅》未足当之也，取《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以益之。庶学者诵习佩服既久，于训诂名物制度之昭显，民情物理之隐微，无不了然。无道学之名，而有其实。”道光元年刊本，七叶衍祥堂藏板。

③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4页。

④ 《诗古微序》，载《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20页。

⑤ 《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41页。

⑥ 《己亥杂诗》第58首云“张杜西京说外家，斯文吾述段金沙。导河积石归东海，一字源流奠千哗。”自注“年十有二，外王父金坛段先生授以许氏部目，是平生以经说字，以字说经之始。”参见《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14页。

⑦ 《尔雅》有“释虫”、“释鱼”等篇，故名，对从事此类学问的贬称。东京卖饼家则是对《公羊传》的贬称。《三国志·魏书·裴秀传》注引《魏略》：“（严干）折节学问，特善《春秋公羊》。司隶钟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此说，可参见刘逸生等《龚自珍编年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1页。

⑧ 《魏源集》附录《邵阳魏府君事略》，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⑨ 《清史列传》卷68，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孙数人而已。”^① 孔广森一生精力多用在《春秋公羊传》上，有著作《春秋公羊通义》。看来其《公羊》学出自庄存与是可以肯定的。据此，我以为孔广森当列入常州学派。

经今文学在晚清成为显学，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龚自珍、魏源两人的影响。梁启超曾经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然电受。”^② 又夏曾佑赠梁启超诗云“璫人（龚）申受（刘）出方耕，孤绪微茫接董生。”^③ 嘉道以后，今文学受到人们的重视，一方面是时代的原因，一方面是乾嘉考据学本身问题多，至其末流，冗沓烦琐，人所厌观。今文经学的新经义，令人耳目一新，为学人所乐意接受。上有在朝显贵达人倡导，下有民间经师景从，在晚清形成一股很大的思潮。如光绪朝世称“翁潘”的潘祖荫，涉猎百家，喜搜罗善本书、金石碑版之属，通《公羊春秋》。人称“同光间，承龚、魏余风，今文经学盛行，许、郑之谊遂微。公益从而左右之。元和江标出其门，视学湘中，创设时务学堂，益务张‘新周改制’之说，固清季学术变迁之一大关键也。”^④

潘祖荫“益从而左右之”，即倡导之意。江标所张的“新周改制”即为《公羊》之义。又有督学使者徐仁铸，仿张之洞《輶轩语》作《輶轩今语》，以告湘人。徐氏书中云“经学当求微言大义，勿为考据训诂所困”，“经学当以通今为主义”，“经学当先通《春秋公羊传》”，谓《春秋》是孔子生平最大事业。《春秋》一书，实孔子所定之万世公法，书中的褒讥贬损，是当时不得已的办法。微言大义通过口说传之弟子，即公羊子所传大义云云。^⑤ 时务学堂是官办学校，这样大张旗鼓宣传《公羊》学，影响必然很大。

汪荣祖《康有为论》说“浙江戴望将常州之学引入两湖，再由湖南越岭南入广东。四川的廖平即从湖南王闿运学经今文。在康有为出生之前，经今文的公羊学已起了政治效应，成为经世之资。这种风气既已传到广东，康于粤中接触到公羊今文，并不令人感到意外。”^⑥ 这又是另一条传播常州之学的途径，可以视为民间行为。梁启超说王闿运虽以治《公羊》有名于世，但终系文人，所得甚浅。章太炎更明确表示王闿运非常州学派，理由是王早年尝至广州，为陈澧所诃，不肯服惠、戴，又与邵懿辰意见不合，故不肯步常州后尘。从学术上说，王从词章入经学，一意笃古，文体规摹毛、郑，发明虽少，然亦杂采古今，“无仲舒、翼奉妖妄之见”。至于皮氏亦先从吴、皖入手。后来以翁潘当道，不谈今文则谋生将绌，故以此投时好，然也不尽采今文。章氏主张将王、皮单立湖南一派。^⑦ 廖平从王闿运学，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严守今文学立场，是个纯粹的今文学家。康有为受廖平影响，这是历史事实，连梁启超也说“不可诬也”。

不管怎么说，湖南的王闿运、皮锡瑞，四川的廖平，虽然也从事经今文学研究，纯学术研究的性质多一些，还是过去经师的风格。他们与龚自珍、魏源借《公羊》议政不同，与康有为、梁启超借《公羊》为变法造舆论也有很大不同。职是此故，我以为他们不当列入常州学派。晚近以来，人们多将今文经学派、公羊学派、常州学派三者习惯性通用。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宜分别清楚为好。

责任编辑：尚永琪

① 庄存与《味经斋遗书》卷首，光绪八年重刊，阳湖庄氏藏板。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参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参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④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546页。

⑤ 叶德辉《輶轩今语评》，载苏舆编《翼教丛编》卷4，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⑥ 汪荣祖《康有为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4页。

⑦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4、6页。